

常思量 不能忘 ——怀念贾植芳先生

陈青生

那时电视台正播放《水浒传》一类的电视剧,我大概受到影响,拟稿中写了“《书窗》为刊发文学史料文章提供了又一个舞台,各路文史好汉可以在此施展拳脚”之类的话。先生看稿后删去这些文字,对我说:“这段话江湖气太重,咱们毕竟是文化人,这样说不合适。”



贾植芳、任敏夫妇。摄于1980年代

贾植芳先生辞世有十二年,然而,先生的音容笑貌和我与先生相处的情景,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时在1980年。那年8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香港学者卢玮銮先生到上海访问,她是丰一吟先生的朋友。丰先生特意安排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的几位同事,在她家里与卢先生见面。那天到丰先生家的还有上海图书馆的萧斌如先生、复旦大学的唐金海先生,再有就是贾先生。那时,先生恢复自由不久。这位年近古稀、身材瘦小但筋骨刚直的老人和他那一口浓郁诙谐的山西话,给这次聚会增添了许多快乐。我那时不到三十岁,是聚会人员中最年轻者,能见到久闻大名的贾先生,对我来说是意外惊喜。但自知浅陋,我不敢在众多前辈中胡言乱语,也就听多说少,尽管由于听得懂先生的乡音,临时客串过将先生所言“转换”成普通话的解说员,还是遗憾没能让先生记住我。

1988年夏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合作筹划、举办的“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这是1949年之后,有大陆、香港、台湾学者在大陆共同参与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当时意义非凡,影响不小,贾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是这次会议的会务,迎来送往,端茶倒水。这次有幸使细心的贾先生记住了我,故而他在为拙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

所赐序文中,说他和我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的。

1993年初,史科学学会在济南举行会议,贾先生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件是他在会议致辞中特别强调“文学史料研究有着超乎单纯学术研究之外的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就更应从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本着对中华文化负责的态度,克服一切干扰,去从事这项严肃的工作”。另一件事是会后组织到曲阜参观,晚上当地一家企业设宴招待,邀请贾先生讲话。贾先生开口第一句话是“谢谢某某企业赏饭”,话音未落,饭厅满是掌声和笑声。接下来,贾先生说,史料工作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不容轻视,而史料工作者是人,不能不吃,吃了饭才能做事情,也希望各位学者在吃饭后努力工作,为祖国的文化传承多做贡献。这个讲话,除了切合晚宴的场合,还隐含了对当时知识分子待遇甚低的不满及应该改变这一状况的呼吁。贾先生话音一落,饭厅里掌声更响,甚至还有欢呼声。

从1993年那次会议之后,承蒙先生信得过,我成为先生与学会方面联系工作的助手。那时手机尚未普及,连电话联络也不方便,文学史料学会领导商讨工作,主要靠信函往来。在先生担任会长的几年间,仅经我写给北京的工作信件即有几十封。这些信函是贾先生为史科学建设费心操劳、

谋划运筹的一个缩影。贾先生担任会长,从不过问学会每年的活动经费有多少、开支情况如何,也从未领取过一分钱报酬,完全是义务性质。

第一次登门拜访贾先生之后,我在这天的日记记下对先生的印象:“先生谦和、热诚、健谈,言辞平实、幽默。”这个印象,在以后与先生的交往中,未曾改变且逐渐加深。

先生在学术界德高望重,却从不自炫自大,到哪里都不卑不亢,平和待人。刚协助先生工作时,我四十岁刚过,先生见到我就叫“老陈”。我听了不好意思,也感觉不妥,就对先生说:“您比我父亲的年纪还大,以后叫我名字或小陈吧,别叫我老陈。”先生听了笑着说:“好,好。哎,老陈,我这样叫习惯了,就这样吧。”于是,先生一直这样叫我,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先生嗜烟好酒,尤其对卷烟,只要待在家里,几乎手指终日夹着或捏着烟卷,以至两手的食指和中指早被熏成黄褐色。先生对卷烟的优劣贵贱似乎并不讲究,只要是烟,他都可以享受。家中客厅里有先生专坐的圈椅。先生吸烟时,往往倚靠椅背,微微昂首,不动声色地吸一口,又不动声色地让烟雾从嘴里或鼻孔出来,目光里时常流露出睥睨宵小的神情。我常常觉得,这姿态看上去有些高傲,却很符合先生厌恶卑鄙、追求自由、崇尚正直的性格。先生告诉我,以前爱喝白酒,刚平反时,还提着一瓶白酒

去施蛰存先生家里,两人对饮;后来很少喝白酒了,每天的午饭、晚饭时,喝杯葡萄酒或黄酒。先生说,有次得病去看医生,医生对我说,要戒烟戒酒,我对医生说,那让我死了算了。说完哈哈一笑。

先生健谈,尤其是和愿意相处的人在一起时,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先生不止一次说,他喝“五四”的狼奶成长,血管里流淌着“五四”的血液。刚同先生来往时,说到学会工作,我说有什么什么事向先生汇报,先生说,咱们聊聊,不要说“汇报”,“汇报”有等级意识,咱们平等,要继承“五四”传统。有一次我们谈到一份文学史料稿件,我说是不是修改后发表,先生说,有些编辑喜欢擅自改动投稿,是“好为人师”;文责自负,编辑有权不用投稿,但无权修改文稿,做错字、误字、漏字等改动除外。先生说,这也是“五四”传统之一,即尊重个人,尊重个性。

先生厌恶学界不良风气。说有一批人利用所处地位的便利,“靠近水楼台”取得课题,再外面去找写手帮他完成,然后得名得利;他说这批人不是“学者”,是“文化掮客”。在我听到这些评语时,立即想到鲁迅先生称赞速写高手的话:寥寥几笔,就勾画出对象的形象和神态。

先生有时也调侃自己。他说,几年前他应邀到日本讲学,演讲时学校安排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当翻译,没想到这位留学生听不懂先生的山西话;于是先生改讲日语,这一来轮到日本学生

听不懂了。先生说,老陈你看,我讲中国话中国人不懂,讲日本话日本人不懂,我和任敏就是去玩了一趟。这一类的“贾版笑话”还有一些,有的还在先生不少朋友和学生中流传,知者甚多,没必要在此复述了。

先生经常叮嘱我多读书,常问你最近看什么书。先生赞同“读书无禁区”,认为读书不会妨碍社会发展,愚昧才阻碍文明进步。他的藏书虽然主要是文史类的,但内容庞杂,似乎什么都有一——当然是有价值的。先生托我给他买过好些书,也借给我看过一些外间难以看到的书,如从日本复印的中国失传古籍《浪史》等。有一次和先生谈到抗战胜利后,上海出过一部小说《亭子间嫂嫂》,当时有舆论指责其为“黄色小说”,我说找过几家图书馆都看不到此书。先生说他有,是从上海书店借的,让我取回家看。读过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部描写上海社会市井生活十分出色的作品,并将我的看法写进介绍40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学的拙著中。

1997年年中,上海书店接替《古旧书讯》的《书窗》发刊。出版前,由于曾酝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与该刊合作,故而范泉先生吩咐我转告先生,请先生写一篇发刊贺辞。我报告先生后,先生要我代他先拟出文稿。那时电视台正播放《水浒传》一类的电视剧,我大概受到影响,拟稿中写了“《书窗》为刊发文学史料文章提供了又一个舞台,各路文史好汉可以在此施展拳脚”之类的话。先生看稿后删去这些文字,对我说:“这段话江湖气太重,咱们毕竟是文化人,这样说不合适。”这件事,让我感觉到先生对于“文化人”身份的看重和敬畏。

有一次看望先生,先生说起他以往的一段经历。恰巧录音机带在身边,我就将先生所说录了下来。回家后,将这次录音整理成文字,又参考先生的其他回忆文章做了补充。整理稿交给先生后,先生很高兴,



1980年8月,在丰一吟寓所合影



1988年,贾植芳在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上讲话